

张世林 编

學林往事

上册

朝華出版社

张世林 编

學林往事

中 册

朝華出版社

张世林 编

學林往事

下 册

朝華出版社

学林往事

上册

张世林 编

朝华出版社

学林往事

中
册

朝
华
出
版
社

张
世
林
编

学林往事

下
册

朝华出版社

张世林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林往事/张世林编.

-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3

ISBN 7-5054-0605-1

I. 学… II. 张… III. 社会科学-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418 号

学林往事(全三册)

张世林 编

朝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100044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49 印张 1132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98.00 元

ISBN 7-5054-0605-1/G·01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卷 首 语

干工作不但会上瘾,还会在干的当中触类旁通,生发出一些新的想法。我编《学林往事》这套书就是这样,完全是由编《学林春秋》一书引发出来的。

《学林春秋》是请作者自己撰文介绍治学的历程及其治学经验的,我在最初组稿时便规定,文章应包括个人的简历、师承和治学历程及经验三部分,重点写后一部分。当文章陆陆续续寄来,我在一篇一篇认真阅读的过程中,除了被他们宝贵的治学经验深深地打动外,他们在文中谈到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治学和为人的影响和帮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些自己比较熟悉的名字:蔡元培、孟森、陈垣、黄侃、陈寅恪、岑仲勉、陈中凡、胡小石、胡适、赵元任、郭绍虞、顾颉刚、汤用彤、蒙文通、冯友兰、傅斯年、朱东润、于省吾、徐中舒、游国恩、罗常培、郑天挺、罗庸、王力、向达、冯沅君、唐兰、唐圭璋、罗尔纲、魏建功、赵景深、李方桂、侯外庐、韩儒林、陆侃如、缪钺、王季思、丁声树、苏秉琦、邵循正、夏鼐、钱锺书、谭其骧、何其芳等等,更是给我以强烈的震撼,虽然文中按要求未能详谈,但这些大学者们的业绩更应该记述下来,介绍给今天年青的读者,使他们知道学有所自。另外,这些重要学人的治学活动基

本始于本世纪的上半叶,与他们的学生和弟子,即《学林春秋》的作者们的治学活动正相衔接。由此我想应该再组织一套专门介绍已故的大学者们的治学和为人事迹的文章,旨在与《学林春秋》配套,为研究和总结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提供较为系统、完整、可信的史料。还是说干就干,因为和一些大学者接触过的学生和弟子已为数不多了,且也都已是耄耋之龄了,再不及时抢救,怕也是要悔之晚矣。当然,有些已故大学者的业绩已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但由于作者自身的原因,或有所遗漏,或得自于第二手资料和道听途说而不够准确,不够真实,不那么亲切。针对这一状况,我在确定作者时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首选的是这些大师们的嫡传弟子或和这些大师们共过事的同事,迫不得已时再选亲属和子女;同时强调,一定要写过去所没有写过的事情,而且要紧紧围绕着有关这些大师们的治学和为人这两个方面来叙述,既避免与过去已发表的资料相雷同,又能与《学林春秋》一书的内容相配合。我连名字都已经想好了,干脆就叫《学林往事》吧。

此时,《学林春秋》一书的组稿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又加入了《学林往事》这一套书的组稿工作,真是够我忙的!不过,好在前一套书的许多作者就是后一套书的作者,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是最合适的作者。例如蔡尚思写蔡元培、王钟翰写孟森、程千帆写黄侃、吴宗济写赵元任、季羨林写胡适、杨明照写郭绍虞、史念海写顾颉刚、任继愈写汤用彤、张岱年写冯友兰、邢公畹写罗常培、王永兴写郑天挺、刘又辛写罗庸、杨志玖写向达、马学良写李方桂、冀叔英写赵万里、徐规写张荫麟、方龄贵写邵循正、赵俪生写王瑶和冯契、卞孝萱写范文澜、周勋初写胡小石、林沅写于省吾、缪文远写徐中舒、唐作藩写王力、王尧写于道泉、王敦书写雷海宗、邓绍基写赵景深、陈得芝写韩儒林、徐苹芳写夏鼐、王水照写钱锺书、曹道衡写何其

芳等等,真可谓是非他们莫属!他们和所写的人都有直接的师承或亲身的接触。当然,真正组稿时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比如谁来写胡适?最合适的人选是邓广铭先生,可还没容我有这一想法,邓老就驾鹤西归了。再就是何兹全先生了,当我向何老说到此事时,他告诉我在此之前已写了一篇九千多字的介绍胡适的长文发表了,一时没有什么新内容可写了。找年青一点的研究胡适的专家写吧,可他们根本没有见过胡适,只能是转述。最后,我想到了季羨林先生,当我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向他汇报后,问他这书中少了胡适行吗?季老明确告诉我不行!并说环顾左右,只有他确和胡适有过接触。于是,季老只好放下其他工作,来写介绍胡适的文章了。

再有,就是有些老先生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弟子和学生来写,只有请他们的家人来写了,如魏至写魏建功、浦汉明写浦江清、游宝谅写游国恩、黎泽渝写黎锦熙、齐文心写齐思和、缪元朗写缪钺、何孔敬写朱德熙等,也是相知甚深、持论公允之作。

这些文章不论篇幅长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内容丰富,情思真挚,朴实无华而生动感人。你会从一篇篇文章中看到一代代的真正的学人,他们为了追求真理,承传和发扬光大中华文明而历经坎坷,饱受磨难而矢志不渝,奋斗终生。甚至以死来抗争!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道德文章,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风!足以昭示后人怎样做人与为学。

林沅先生写于省吾老常常说到一个人越学越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无知,为此,他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开始学习和写作,常年不辍。他在书案上压着自己手书的“学到老,学不了”纸条作为座右铭。生动地说明了学习是没有止境的,真正的大学者是不应该骄傲自满的。王力先生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他在晚年

还写出了多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他除了授课、带研究生外,还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社会活动。他是哪来的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呢?做为王老的弟子,唐作藩先生介绍说,王先生从不浪费每一分钟,从外面开会回来,离吃饭哪怕只有十几分钟,他也要坐到书桌前,继续学习和写作。而其他人士则会认为这一小段时间不好利用。这也是王老治学有成的一条经验。胡适先生曾经做过中华民国政府派驻美国的大使和北京大学的校长,但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学术研究。季羨林先生介绍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胡适到北京图书馆参加一个会议,刚到会便声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会议要出席,只能中途退场。但当会议的话题转到他正在研究的《水经注》问题上时,他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到散会还兴犹未尽,早把他要参加的那个重要会议丢在了脑后。可见,他毕竟是书生。李方桂先生不愧是闻名世界的大学者。他品德高洁,虽身处乱世,却淡泊名利,一心向学。当时他的老友傅斯年受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委托,欲请他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李先生先是听而不闻,继而才藐视地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先生听后躬身退出,口中喃喃地说:“谢谢先生指教,我是三等人才。”马学良先生在文中就是这样介绍李方桂的。开创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大家朱东润先生,在“文革”中经历了各种磨难,但他的倔强也充分显示出来了。在批判他的大会上,他始终不肯低头,甚至敢于和按他头的人扭打起来。朱先生就是这样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的。于道泉先生不仅是研究藏学的大家,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他从国外学成回来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未想过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他认为革命胜利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了,自己再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不过是想做官而已,真是惭愧,所以,再不愿去申请了。这

就是王尧笔下的于道泉先生。学识渊博的魏建功先生,解放后一心听党的话,认真改造自己,以至于下面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跟党走”。“文革”中他被“四人帮”利用,进了“梁效”班子;“文革”后期,当人们认清了这场运动的性质,怨声载道之时,有一天,一位学生去看他,他还在讲“大革命”对他的教育。这位学生起初以为他是在讲1927年的大革命,后来才听明白他是在说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教育。这件事后来成了笑柄。他知道后,才沉痛地说:“我又跟错了。”看到这段描述,我的心在流血。是谁把这样的大学者坑害到这个地步!这是对人类文明和良知的粗暴践踏!这样的事情今后是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最后,我还是想再介绍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著名学者,他就是顾廷龙先生。沈津是顾老的弟子,他在文中介绍了许多有关顾老为人和治学的业绩,因为我和顾老的接触比较多,所以读来十分亲切,可谓感同身受。特别是文中谈到顾老晚年欲重修《吴大澂年谱》一事,是我亲自经历的。顾老自1992年做了大手术后,一直住在北京,我得以经常去看望他老人家。那时他已是近九十高龄的老人了。每次见面,他同我谈的最多的是书,托我办的最多的是买书和借书。后来便谈到了他想重修《吴大澂年谱》一事,并告诉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许多吴的信札,他早年写吴的年谱时没有看到,现在要重修,很想看到这些信札,托我代为联系。我通过熟人和历博联系好了,于1996年10月10日陪顾老去历博看信札。信札一共有五册,共一百多通。顾老看后很高兴,提出要翻拍成照片备用,我也帮他办了,事后还亲自送到顾老家中,顾老说这些对他重修吴谱很有帮助,并说在青岛一个人的手中还保存有吴的信札,想打听清楚后再设法联系。这就是顾老,一个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所念念不忘的事情。可惜天不假年,顾老未能完成重修工作

而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从他老人家身上不正好体现出真正的学者“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风范吗!每次读校样,读到我所熟悉的一些老先生,特别是顾老时,我都不禁热泪盈眶。我都会被他们的这种死而后已的治学精神所深深地感动!1998年5月,我去信请顾老为我正在编的《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二书题签。蒙顾老厚爱,欣然命笔,不仅为我题了书签,还赐我用大篆写成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条幅。收到的日期是5月28日。6月上旬顾老就因病住进了医院,两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了。每一念及,则不禁泫然。顾老厚我,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多编好书,来报答一生与书打交道的顾老了。

举了上述的例子,我想是书的价值已无需多说了,读者自会明辨的。本书共收文一百零二篇,介绍了近一百一十位已故大学者的事迹(当然,最初组稿要比这个数目略多),与《学林春秋》合而观之,共介绍了活跃于20世纪各个时期的中国学术领域里的重要学者近二百四十人,庶几可以为研治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人们提供一份比较系统、准确和完整、可信的研究资料了。果能如此,则吾愿足矣!

最后,我还要真心地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占领兄,他在刚刚完成了《学林春秋》一书的责编工作后,又不辞辛劳,承担了这份工作,并一如既往地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细致认真地工作,消灭了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为保质按时出版该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还要感谢陈铮和杨辉君两位先生,他们通读了本书的校样,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改正的意见,从而使本书得以少出现一些错误。

当编辑时间长了,越来越体会到“校书如扫落叶”,错误特别是

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不当更是在所难免,虽然我们很想消灭每一处错误,但当加班加点、接连熬夜校稿,以致两眼对不准焦距时,错误也就混过去了。为此,除了请读者原谅外,尚望不吝赐教,以便今后改正。

张世林

写于2000年3月13日清晨六点

目 录

上 册

我在老师中首先想到蔡元培	蔡尚思 1
--------------------	-------

蔡元培最难能可贵的是始终坚持一种大无畏精神,如他在晚清时代,是唯一无二的翰林造反者;在北洋军阀时代,是独自大胆改革北京大学,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而与北洋军阀对抗;在国民政府时代,更以国民政府委员而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尽力营救大批被捕的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员,带头为鲁迅出殡执绋,公开演讲,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研究。

孟森先生与邓洪二师	王钟翰 7
-----------------	-------

1936年秋的一个晚上,燕大历史系史学会邀请孟先生来讲学,其实不过是一次孟先生与邓文如、洪煨莲二师座谈,到会的有齐思和、谭其骧、聂崇岐、邓嗣禹、赵丰田等人。两个多小时的座谈,差不多都是孟先生和邓、洪二师讨论有关清史史料的评价问题,孟先生强调清代档案的重要性,大有舍档案之外无从解决清史问题的可能之势;邓、洪二师除承认档案的重要性外,还提出了档案亦有真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这样的对话,自然得不出双方都能认同的结论来。

朱启钤与《营造学社开会词》《营造学社缘起》 刘宗汉 29

朱先生是我国近现代一名成绩卓著、影响巨大的学者。尽管先生学识渊博,涉猎学科颇广,但其中最为世人景仰者,是他可提倡的营造之学。他在1929年所创办的营造学社,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建设研究和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基础,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至今,凡是研究古代建筑的学者,追源溯始,无不与朱先生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

记先师金松岑 祁龙威 54

1938年在上海,我始得列金氏门墙。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一直在苏州侍从左右,至其逝世。金氏早年奔走革命;中年聚徒讲学,宏扬民族文化;暮年抗日反蒋,晚节芬芳。著述等身,其《天放楼文言》、《诗集》、《皖志列传稿》等,近年都在海外翻印流传。

我的老师陈垣先生 李 瑚 63

记得在辅仁大学举办的一次运动会上,校长(陈垣)在讲演中慷慨陈词,他引《礼记·射义》中的话说:“古代的运动会上,有三种人不能参加:‘贵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他把不能保卫国家,不能抗御敌人入侵的将军,国亡后在敌伪政权任职的官员,以及为了个人目的而认贼作父的人,都排斥在人民生活之外。我当时在操场上听到这些话很振奋,至今先生的声音仍在耳际萦回。

著名史学家柳诒徵 卞孝萱 孙永如 94

柳先生回忆幼年学习情景:“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廿日

以后,正月半前后,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其余读书之日,自天明起即背书,各书不背完,不能吃早粥。”

师恩难忘

——追忆先师张星烺、余嘉锡、陈垣 来新夏 111

张先生是理科出身,先学采矿,后在德国学化学,因患肺结核在青岛养病。其父张相文系著名地理学家,家富文史藏书,遂利用养病时间,博览家藏,并转而研究历史,很快遍读正史和重要史籍。他具有多种语言基础,便发挥其优势,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翻译了《马可·波罗游记》,辑著了多卷本的《中西交通史料汇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成为声名卓著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从此,他就以史学教授终其一生。

我与黄季刚先生 程千帆 121

1929年冬某日,季刚先生邀同在中央大学任课的陈伯弢、王伯沆、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王晓湘诸先生,登南京鸡鸣寺豁蒙楼游赏。豁蒙楼乃张之洞都督两江时为纪念杨锐所建,亦为当时胜迹。汪旭初先生因事未能来,吴瞿安先生因去光华大学上课,也没有与会。诸位先生游赏之余,兴之所致,因作联句,每吟一句,便用寺中寻得的破笔题写在毛边纸上。

康乐园里忆“二老” 蔡鸿生 133

我于1953年秋季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年那个简朴的迎新会上,系主任刘节先生郑重介绍:“我们系里拥有中古史两位大师: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满门桃李。二老同系任教,是全体师生的光荣。”随后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来自师兄、师妹们的传闻,才知道“二老”一言一